

台灣研究

美国对台政策新解

沈惠平 著

台湾研究

美国对台政策新解

惠平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对台政策新解 / 沈惠平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108 - 0540 - 0

I. ①美… II. ①沈…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 - 台湾问题 - 研究 IV. ①D822. 37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3788 号

美国对台政策新解

作 者	沈惠平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 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8 - 0540 - 0
定 价	38. 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

在中美两国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美国意图“改造中国”的使命，它植根于美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中。这一使命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根深蒂固于美国人的思想观念里，美国对台湾的扶持成为这种“使命”的延续，即以美国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和制度来影响和改造台湾、进而以台湾为“灯塔”促成中国大陆也发生变化，以期最终达到“改造中国”这一美国对华战略目标。换言之，美国的对台政策服从于美国的对华战略和目标，它可被解读为“改造中国”使命的体现。这一使命的作用延续至今，长期以来，美国把台湾当做移植和扩展美国式民主政体和价值观念的重要一环，更是其影响中国大陆政治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台湾是美国对中国大陆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

本书以美国民族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试图从美国民族主义与“改造中国”之使命的关系视角来解读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可从“以台变华”方针的具体演变来探讨。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美国对台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对台政策中“以台变华”方针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在冷战对峙时期，“以台制华”、遏制中共并促使中国大陆内部“崩溃”，同时扶持台湾有朝一日返回大陆成为美国的政策重点，即以所谓的“自由中国”代替共产主义中国；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意识到“遏制加孤立”的政策并不能促使中国大陆内部发生改变，“和平方式”开始酝酿，于是，“欲改造中国，必先改造台湾”的设想被逐步提上政策议程。到了60年代中期，“以台变华”的方针得以最终确立。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之后，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接触虽为演变中国大陆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美国依然认为应该加速台湾的“民主化改造”，“以台变华”的方针由此付诸实施并逐渐明朗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台政策中“以台变华”的方针被全面推行，台湾实际上充当了美国向中

国大陆推行“和平演变”的“据点”和前沿阵地。总之，美国意图以台湾的局部之变促大陆整体之变，以台湾的先行之变促大陆后来之变，亦即通过对台湾的“民主化改造”来促进中国大陆迈向“民主化”，最终实现“改造中国”之目标。这一意图致使中国的统一大业依然任重道远。

目 录

绪论 探究美国对台政策的真实意图	(1)
------------------------	-----

上篇 美国民族主义与“改造中国”的使命

第一章 美国民族主义	(26)
第一节 民族与民族主义	(26)
第二节 美国民族主义的内涵和特征	(44)
第三节 美国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	(53)
第四节 小结	(64)
第二章 美国民族主义与“改造中国”的使命	(68)
第一节 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	(68)
第二节 什么是“改造中国”的使命?	(84)
第三节 美国民族主义与“改造中国”的使命	(91)
第四节 小结	(94)

下篇 美国对台政策的解读：一种美国民族主义视角

第三章 台湾问题与美国对华战略	(99)
第一节 美台关系的历史演变	(99)
第二节 台湾问题的产生与实质	(110)
第三节 美国对华战略：遏制、接触还是接触加防范?	(118)
第四节 小结	(130)
第四章 中美关系缓和前美国的对台政策	(133)
第一节 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化	(133)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的对台政策	(148)
第三节	三次台海危机与美国的对台政策	(156)
第四节	小结	(167)
第五章	中美建交前后美国的对台政策	(172)
第一节	中美关系的改善	(172)
第二节	尼克松、卡特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	(179)
第三节	里根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	(186)
第四节	小结	(194)
第六章	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台政策	(197)
第一节	老布什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	(197)
第二节	克林顿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	(210)
第三节	小布什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	(220)
第四节	小结	(227)
结 语		(230)
第一节	如何认识美国民族主义?	(230)
第二节	如何认识美国民族主义与“改造中国”使命 的关系?	(234)
第三节	如何从美国民族主义与“改造中国”使命的关系视角 解读美国的对台政策?	(240)
第四节	小结	(246)
附录	美国对台政策大事记	(248)
参考文献		(253)
后记		(265)

绪论 探究美国对台政策的真实意图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中共在内战中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给当时美国朝野带来了极大的震惊和恐慌，也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一场所谓“谁丢失了中国”的激烈争吵。1949年8月，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①在递交《美中关系白皮书》时所附的信上曾经指出：“不幸但又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结局超出美国的控制能力，美国尽其所能所做或者可能做的任何努力都不能改变这种结果，美国已经尽力而为了。”^②要言之，艾奇逊等人的解释是，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致使其失尽民心，因此，蒋介石政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但国民党的失败并不等于美国的失败。相反，“他们认为美国需要耐心，在中国失去影响只是暂时的，待‘尘埃落定’之后，美国影响早晚得以重返中国，美国人有朝一日将在中国重新担负起原先的使命。”^③说到这里，人们首先会产生疑问，美国人在中国究竟担负着什么样的使命？其次，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使命？最后，这样的使命对中国的发展真有帮助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学者戴维·麦克林（David McLean）曾经就中共的胜利对美国的心理影响问题指出：“中国新政权对美国的冒犯要比它虐待美国人员、在宣传上对美国的攻击、对美国经济利益的挑战或中共控制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战略威胁要深得多。中共对美国最深刻的冒犯在于，通过忠诚于一种非美的（un-American）意识形态和作为美国主要对手的国家，中共出卖了美国要在亚洲实现自己的全球使命的目标……如果不注意中国在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

① 迪安·艾奇逊（1893—1971），曾任美国国务卿（1949—1953）。

② *The White Paper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p. 16.

③ 王缉思：《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载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

(the ideology of U. S. nationalism) 所占据的位置,是不可能对1949—1950年间美国对华政策中最独特的要素给予一个满意的解释的。”^①从麦克林的阐述中,可以推断中国在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如果不对这一重要性给予重视,人们很难更好地理解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所作所为,也就无法更准确地解读美国的对台政策。本书即以美国民族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试图从美国民族主义与“改造中国”之使命的关系视角来解读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化过程,以求教于方家。

一、研究现状

1. 美国对台政策的研究

台湾问题历来就是中美关系研究中经久不衰的重要课题,大陆学界的著述主要对1949年以来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化作细致的考察,或者对某个时段如约翰逊、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进行详细分析,或者对涉及美台关系的相关文件进行整理分析。^②在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中,被大陆学界大量引用的一部著作是陈志奇的《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该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应用资料极为详尽,读者可以从中获取大量的信息。^③西方学者关于中美关系

① David McLean, *American Nationalism, the China Myth, and the Truman Doctrine: The Question of Accommodation with Peking, 1949—1950*,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0, No. 1, Winter 1986, p. 42.

② 相关著述主要包括: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苏格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唐正瑞著:《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1969.1~1999.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肖元恺著:《百年之结—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关系的历史透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忻华著:《羁绊与扶持的困境:论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1961—196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范希周:《试析1948—1968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1期;王缉思:《论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起源》,《世界历史》1987年第3期;范跃江:《半个世纪来美国对台政策的历史进程及规律》,《台湾研究》1999年第4期;孙岩:《析小布什政府关于两岸关系的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4期;牛军:《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一个历史的思考》,《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2期;双惊华:《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李洪波:《美台矛盾研究(1949—2000)》,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论文,2006年;林冈:《美国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取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等。

③ 陈志奇著:《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台北)中华日报社,1981年增订版。此外,胡为真的《美国对华“一个中国”政策之演变》,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一书对尼克松政府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进行详细的考察。

和台湾问题的研究成果是相当丰富的^①，遗憾的是有关美台关系的论著却不多见，即使为数不多的论著也多针对个别危机，而不是就美国对台政策作深入的探讨。已经问世的研究成果中，影响较大的是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的著作《不确定的友情：台湾、香港与美国，1945—1992》。该书认为，美国四十多年来一直是台湾的“保护国”。对台湾而言，华盛顿坚决反共的立场就是台湾稳定和安全的最大保证，只要美国政治领导人把冷战放在第一位，那么台湾就会受到保护。实际上，台湾可以继续以“自己的忠诚”来换取美国的援助，巧妙地应付华府，“使之对台湾内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弊端视而不见或予以原谅”。该书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全面、详尽而又深入地探讨了美台关系，为此书的中译本做评论的《中国时报周刊》主笔林博文称：“《不确定的友情》的最大贡献是，过去三十四年，从来没有一部著作像它这样全面、详尽而又深入地讨论美台关系。”^② 该书的附录二介绍了历年来所有关于美台关系的著作和论文，这也

① 西方学者的代表性论著主要包括：Jerome Cohen, etc., *Taiwan and American Policy: The Dilemma in U. S. -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Praeger, 1971); James C. Thompson Jr., "On the Making of U. S. China Policy, 1961-9: 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50, (April-June, 1972), pp. 220-243; Ralph Clough, *Isl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William R. Kintner & John F. Copper, *A Matter of Two Chinas: the China-Taiwan Issue in U. S. Foreign Policy* (Philadelphia: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1979); A. Doak Barnett, *US Arms Sales: The China-Taiwan Tangle*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2); Stephen P. Gilbert & William M. Carpenter, ed., *America and Island China*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89);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Danny Shiu-Lam Pao,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he Case of Taiwa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00*, ed. Priscilla Roberts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John F. Copper, *China Diplomacy: The Washington-Taipei-Beijing Triangl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1992); Dennis Van Vranken Hickey, *United States-Taiwan Security Ties: from Cold War to beyond Containment* (Westpoint, Conn.: Praeger Publishers, 1994); Martin L. Lasater, *The Taiwan Conundrum in U. S. China Poli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2000). Richard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James R. Lilley and Chuck Downs, ed.,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Press, 1997), 中译本：《台海危机：过去、现在、未来》，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 S. -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The Henry Stimson Center, 2003), 中译本：《悬崖勒马：美国对台政策与中美关系》，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② [美]唐耐心著：《不确定的友情：台湾、香港与美国，1945至1992》，新新闻编译小组，（台北县）新新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是此书价值之所在。而台湾与美国自 1949 年后的复杂关系，在唐耐心理首大量解密档案、历史人物访谈与学术资料，终于在《海峡对谈》这一新书中，首度呈现了一甲子历史的纵深，不再仅限一般十年或廿年的分析。^①

简言之，目前学界就美国对台政策的研究文献，不论从美国的地缘战略、亚太战略甚或全球战略，从美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利益角度，还是从美国的意识形态（战略）利益视角进行考虑，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几乎都认为美国对台政策的出发点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其典型的表述如下：“美国对台政策始终是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维护和促进美国在世界和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促进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为基本前提。”^② 但对于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研究者见仁见智。由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真实含义的理解差距过大，所以目前学界对美国对台政策的研究没有深入。而这涉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即对美国民族主义的研究。

2. 美国民族主义的研究

众所周知，在这个民族国家仍然为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存在着民族主义，美国亦不例外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会本能地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自身和外部世界，其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就是民族主义。不仅如此，民族主义在美国是很有影响的。比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的产物，美利坚民族要摆脱大不列颠民族的统治与压迫。或者说，美国的民族主义是和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相关的。这时的民族主义应该说是积极意义的，即它符合民族主义一般的定义——指“被征服、被宰制或者被压迫的情境中”，“从属的政治群体”的政治运动。然而，后来随着美国的发展和强大，美国的民族主义则成了其向外扩张的动力和依据。“美国伟大”、“天定命运”和“美国例外论”等观念都是这种民族主义的表现。简言之，美国虽不是一个倡导“民族主义”的国家，但“民族主义”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①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美学者新书：台美好友 60 年来却互不信任》，查阅：<http://www.gogotaiwan.cn/Default.aspx?TabId=1092&ArticleID=25089>。

② 霍特、江山：《布什的台湾政策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长期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 年第 5 期，第 89 页。

目前大陆学界对美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散见于一些论文之中,如时殷弘等人的《美国极端民族主义》、刘建飞的《民族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王缉思的《美国霸权的逻辑》以及吴嘉蓉的《浅论美国的宗教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作用》等论文。^① 概而言之,上述研究成果表明美国的民族主义是客观存在的,尽管许多美国人在主观上不大愿意承认这一点,它在其形成早期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本质上讲,这种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因素在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种族、宗教、文化多元化和民主外延的扩大,“天定命运观”过渡到“普世价值观”,已与美国在全球的扩张和霸权融为一体了。而曹瑞臣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美国民族主义的历史轨迹》一文则通过探讨历史上民族主义的缘起与演变来看近代美国民族主义的历史轨迹,认为美利坚民族的政治理想、天赋使命观和民族自豪感铸就了当今的美国民族主义。而且,在当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民族主义日益成为重要的动力。^②

总的来看,虽然国内对美国民族主义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是专著性成果并不多见,首部以“美国民族主义”命名的著作《美国民族主义——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根源》,就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美国民族主义与国家安全战略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通过对历史和现实政策的梳理和解读来论证美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就是在美国民族主义指导之下不断扩张、追求世界权力的历史。这确实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美国民族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但是总体的论述不够深入。其他有关美国民族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散见于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著述之中,如刘建飞在《美国与反共主义》一书中的部分内容就论述了民族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周琪则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一书里的第二章“美国例外论——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中谈道,她赞同

① 时殷弘、崔建树:《美国极端民族主义》,《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1期;刘建飞:《民族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吴嘉蓉:《浅论美国的宗教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作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等。

② 曹瑞臣:《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美国民族主义的历史轨迹》,《世界民族》2004年第3期,第14-22页。

美国研究者几乎一致公认的观点，即“美国例外论是理解美国人的自我形象、民族主义、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的关键”，由此可见，不了解美国例外论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的民族主义。在此基础上，她比较详细地对所谓的“美国例外论”的起源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源泉，它不仅孕育了指导美国19世纪扩张的“天定命运”之说，而且从美国立国起就是其理想主义外交政策以及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根源。^①可以说，周琪对美国例外论的阐述为我们理解美国民族主义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见解。此外，王晓德虽然不是专门研究美国民族主义的学者，但他的著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民族主义，比如他在《美国文化与外交》^②一书中对美国文化与外交（政策）之间关系所作的分析和阐述对进一步研究美国民族主义是有助益的。其中，他对“天赋使命”的诠释尤为有用，这是因为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即关于美国特殊命运的思想是美国民族主义的核心，所以，不充分理解美国的“天赋使命”说，将很难分析美国的民族主义问题。王立新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的第二章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人的自我形象、国家认同思想、对国家伟大的不同观点以及国家使命观和完成使命的方式。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出美国民族主义的三个特征：在全世界推广和实现美国价值观和理想成为美国民族主义的重要目标、美国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以及美国惯于寻找“他者”即自由的敌人来强化自身的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力。^③潘亚玲在《美国爱国主义与对外政策》一书里对美国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的民族主义。^④在国内就该主题的研究而言，目前所能找到的学位论文也不多，如潘亚玲的博士论文《“9·11”后的美国爱国主义与对外政策》（复旦大学，2007）、张爽的博士论文《“美国至上”：对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

① 刘建飞著：《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225页；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171页。

② 王晓德著：《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③ 王立新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8-151页。

④ 潘亚玲著：《美国爱国主义与对外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一种解读》(复旦大学, 2004)、杜丽的硕士论文《冷战后美国民族主义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福建师范大学, 2007)、孙玉婷的硕士论文《杜鲁门时期美国“冷战共识”的形成》(山东师范大学, 2006)、张妍的硕士论文《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中的新闻媒体因素分析》(中共中央党校, 2004)等。这些学位论文就美国民族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某个部分或某个时期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 给予人们不少启示。虽然如此, 国内所有的研究整体感似乎稍嫌不足, 并且都有待更为深入地研究, 比如对美国民族主义的特殊性的探究。

讲到美国的民族主义, 几乎所有的西方(主要是美国)研究著述首先都要提到美国的民族认同或民族意识的独特性, 即与其他民族的认同主要指向本民族的传统、土地、血缘和社群等相比, 美利坚民族的民族意识则主要由普适性的社会、政治价值观(体现在所谓的“美国信念”之中, 或者说美国信念是美国民族认同的独特根源)所塑造。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①所言, “大家基本上都同意, 美国是根据某种政治理想构建出来, 并受着自由平等承诺或梦想的激励。这些政治理想是美国国民认同的核心, 在推动美国政治演进和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②或者说, “美国人对美国的认同, 主要在于政治理念和体制, 而不在地方。”^③由此导致美国人倾向于认为, 美利坚民族是上帝的选民, 他们注定要在新世界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 作为照亮其他国家的“灯塔”。如此一来, 美国例外论应运而生。所谓美国例外论就是指这样一种观念: 上帝选择了美利坚民族(作为上帝的选民)把它安置在北美这片新大陆上, 并赋予它特殊的使命——在这里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样板。美国因此成为一座“山巅之城”(a city on a hill), 是世界各国光焰夺目的榜样。美利坚民族还由此肩负着上帝所委托的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的使命。“例外论”在美国深入人心, 这是因为许多美国人认为, 作为上帝选择的一

① 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 又译作赛缪尔·杭廷顿, 当代颇有争议的美国政治学家。他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 认为21世纪核心的政治角力是在不同文明之间而非国家之间。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周端译:《失衡的承诺》, 东方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1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程克雄译:《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新华出版社, 2005年版, 第44—45页。

个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命运承担着一种特殊的责任，负有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经指出的，美国例外论是美国信仰体系的核心，它有助于确立美国“想象的共同体”^①，这种神话根深蒂固于美国白人文化之中，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其结果，当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时，这种使命观对政府决策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体现出来，成为表现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如美国历史学家莫雷尔·赫尔德（Morrell Held）等人在《文化与外交》一书的导言中写道：“美国外交事务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仰，即美国在外部世界关系中享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②

当然，迄今为止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国外学者对美国民族主义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专门论述不多，目前所能见到的比较系统论述美国民族主义的英文著作主要有：汉斯·科恩（Hans Kohn）的《美国民族主义：解释性文集》（1957）、约翰·弗塞科（John Fousek）的《领导自由世界：美国民族主义与冷战的文化起源》（2000）以及阿纳托尔·列文（Anatol Lieven）的《美国对或错：对美国民族主义的剖析》（2004）^③等。这些著作仔细地考察了美国民族主义的性质与特征以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汉斯·科恩的著作可能是第一本专门探讨美国民族主义的文集，他主要讨论了标志着美国民族主义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即美国民族主义的起源、美国民族主义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民族主义的联邦结构、美国民族主义的多族裔特征以及它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地位等。^④约翰·弗塞科在其著作中提出一个新

①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p. 2.

② Morrell Held and Lawrence S. Kaplan, *Culture and Diplomac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7, p. 4.

③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Hans Kohn, 1957)、*To Lead the Free World: 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 (John Fousek, 2000)、*America Right Or Wrong: An Anatomy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Anatol Lieven, 2004).

④ Hans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7, p. 110.

概念即“美国民族主义化的全球主义”(American nationalist globalism),这种意识形态把美国的选民属性、使命和命运等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二战结束后)正在出现的整个世界现在是美国外交政策所关注的恰当空间之观念结合起来。他认为这种理念使得二战后美国的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成为一块硬币的两面,美国正是根据国家伟大与全球责任相一致的观点来确定对苏政策,由此作者进一步考察冷战的文化根源。^①阿纳托尔·列文则指出,美国民族主义在美国的思维和行为中是根深蒂固的,它具体表达了适合于美国与世界的伟大和持久价值的信仰和原则。当然,由于社会分化的原因,美国的民族主义表现出两个主要的灵魂即所谓的“美国议题”或美国公民民族主义(源自“美国信念”)和“美国对立面”(存在种族-宗教根源)。其中,前者支配官方与大众的政治文化,是美国在世界中的权势和影响的主要支撑,并给人类提供大量的积极教益。后者则是“美国信念”的对立面,是“受伤的复仇的民族主义”,它会导致对外部世界无端的仇恨甚至恐惧,再加上强迫症式地相信美国“精英”和知识分子背叛祖国,这不但在国内是破坏性的,也贬低了美国人具有特殊的使命去帮助其他国家这一在历史长河中为很多领导人和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阐发的理念。因此,美国精英应该对自己祖国给世界树立的榜样更有信心,也更关注,这一榜样是通过其公共机构、其价值观和日常美国人的幸福生活展现的……美国以经济发达的多元民族国家这一形象展现在所有种族面前,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一形象由于其根本性的和平、非扩张特征和很大程度上的真实性变得如此强大,美国人有必要继续确保这一形象的真实性的。^②如上所述,这些著作都提到美国信念、美国例外论主要决定了美国民族主义的特性,进而言之,美国独特的民族主义又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产生了相应的结果。此外,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讲述同美国外交政策有关的三种意识形态(对国家强大的看法、种族等级观念和对革命的态度)的历史,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即美国外交政

^① John Fousek, *To Lead the Free World: 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② Anatol Lieven, *America Right or Wrong: An Anatomy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4-6, 222.

策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可追溯到这些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与美国民族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关系,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二者相辅相成,或者说外交政策的核心观念原本出自占优势的民族主义,当美国变得日益强大后,这些观念的实施又反过来使早先就有的国家观念进一步巩固。最后作者还就美国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提出一些建议,并且指出,“削弱美国的民族主义,对鼓励民族主义的例外论意识甚至哪怕是稍加非难,也将带来真正的危险”^①。由此可见,虽然此书并不专门探讨美国民族主义的问题,但非常有助于理解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

此外,迄今为止笔者在外文文献中,仅找到一本被冠以专门论述美国民族主义及其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的学位论文,即《领导自由世界:美国民族主义与1945—1950年冷战的意识形态起源》(1994)^②,该文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是导致冷战开始的意识形态根源并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其他有关探讨美国民族主义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一些文章或演讲稿之中,如《“布什主义”与美国民族主义》(2002)、《美国民族主义的悖论》(2003)、《美国的新民族主义》(2004)、《美国民族主义与“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外交政策》(2004)、《以欧洲为鉴:美国民族主义的危险性》(2004)等^③。其中,保罗·迈克卡尼(Paul McCartney, 2002)认为美国民族主义体现了两种经常对立的价值观:一是普世主义,即美国人与其他人分享同样的道德理想如自由和平等;二是孤立主义,它使得美国人有权追求保存其主权的政策,而其他国家没有相同的权利。这种情况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往往自相矛盾并使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因此,他主张美国应该追求使其权力与理想相一致的政策以改善国家安全的状

① [美] 迈克尔·亨特著,褚律元译:《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② *To Lead the Free World: 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Fousek, John Howard, Ph. D., Cornell University, 1994)。

③ *The Bush Doctrine and American Nationalism* (Paul McCartney, 2002)、*The Paradoxes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Minxin Pei, 2003)、*America's New Nationalism* (Aryeh Neier, 2004)、*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U. S. Foreign Policy from September 11 to the Iraq War* (Paul T. McCartney, 2004)、*In the Mirror of Europe: The Perils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Anatol Lieven, 2004)。